

# 茶具文物馆藏印与岭南篆刻研究

## 终期报告

本计划对茶具文物馆（茶馆）所藏罗桂祥基金捐赠的印章进行首次专门研究，由刘浩敏博士筹划并进行研究工作，邓民亮馆长负责统筹及管理项目，刘伟娟小姐及茶具文物馆人员协助相关项目进行。研究正式开展历时一年，由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，分两阶段进行，目的是全面考订馆藏印章及牵涉的印人数据，建立系统的数据库，且以岭南篆刻及相关印人为研究重点，从而展示茶馆藏印对岭南印学发展的价值及重要性，以期供日后进一步研究、出版或策展之用。整个计划现已顺利完成，所提交的研究成果和报告，充分反映所有项目已达到预期目标。

### （一）、首阶段研究—藏品溯源、基本资料汇整

首阶段的研究工作，分成三个部分进行：口述历史访谈、茶馆藏印资料考订、编撰印人传记。由2017年5月开始茶馆藏印资料考订之工作，另口述历史访谈、订、编撰印人传记部分，7月完成具体流程、联络及策划工作。具体细节及成果，可参考于2017年12月29日所呈交的中期报告。

在口述历史访谈的部分，六个专访先后于2017年7至11月完成，受邀受访者顺序为黄燕芳女士、杜用庭女士、邓昌成先生、禰绍灿先生、陈用博士、区大为先生，目的是先对茶馆藏印的渊源与历史作出重点考究，继而了解岭南篆刻的发展面貌。所有访问录音已整理成文本，成为超过十万字的口述史料，经每位受访者完成审订后，存为数据文件。受访者除了提供口述史料外，也借出多种珍罕印谱、书刊等大量文献资料，以供拍照留底，所得数据和照片均已存为计算机图文件。

考订茶馆藏印数据的部分中，对茶馆藏品编号C1994.0091至C1994.0753，共663项、合印章677方的数据，作全面、系统的研究和整理。首先对印文及边款进行校勘和修订，增补大量文字，处理了基本审定及断句释义的工作，随后，进一步核实刻印者及纪年，加强印章背景资料及来源的历史脉络，有助于搜集、编制茶

馆所涉的印人传记。同时，据上述访问所集得的数据为线索，以追溯藏品源流。所有整理及校订结果，计有印章资料近一万项，包括文字与图文件，全收入电子数据库，方便搜寻使用。

编撰印人传记方面，茶馆藏印牵涉 319 位印人，就预先制定的凡例搜集资料，主要取材自 50 多种书籍和文献资料，旁参篆刻专业网页，再通过校勘、辑佚、辨伪，编写成近六万字的印人传记 279 则。在茶馆既有成果的基础上，增补文字数据十倍，成果丰硕。印人传记及相关原始数据，分别保存为电子版和实体版。

## （二）、第二阶段研究—运用研究资源，总结成果

在首阶段的基础上，第二阶段从 2018 年 1 月 2 日展开，进一步梳理、考证所有研究材料，尤其针对岭南印学相关的部分，涉藏品 181 项，印章共 185 方、印人 59 位，以进行专题式研究，另辟专文以总结及发表这次研究成果。

邓民亮馆长撰〈茶具文物馆藏印考述与特色〉一文，总近八千字，先考究茶馆藏品的由来，厘清了部分馆藏的渊源和历史，后按藏印的传承和风格作分类，尤以岭南相关者为重点，突显藏品的特色和价值。专文摘要如下：

此文揭示是「茶具文物馆藏印与岭南篆刻研究」的重要成果；透过文献、档案数据的梳理和口述历史访问，重整藏印的来由，并重新发现这批藏印对岭南印学发展的价值及重要性。经现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长黄燕芳女士协助整理档案资料，梳理出清晰的罗桂祥博士捐赠印章的经过，并指出藏印来源的几个重要线索和脉络，即集古斋、博雅公司和李祖佑医生。当年任职集古斋的杜用庭女士，讲述了集古斋和 1960 至 1990 年代印石市场的经营情况。同时，确认了罗博士从集古斋先后购入藏印 169 项。另外，从邓昌成先生的访问和他提供的原石手铃本，得知博雅公司和王大山（1933–1993）的关系，并证实茶馆藏品中有 313 项就是当时罗博士购自于王大山的那批印章。从这批藏印的内容和文献考寻，重新发现一位活跃于 1950 至 1960 年代的香港印章藏家李祖佑医生，他的旧藏可能与罗博士的藏印有着密切关系。综上所述基本整理出茶具文物馆 663 项（共 677 方）藏

印的构成经过，并能确定当中 482 项藏品的来源。

藏品所见，可以归纳出罗博士收藏的三个特征：第一，他并不着眼于石质、石材；第二，他不以收藏古玺印为尚；第三，他不特别钟情某些流派，也不偏重某些名家，主力收藏明清以来不同印人、不同风格流派的印章，追求品类齐全。罗博士收藏时不是基于个人喜好，而是他早已设想将这批藏印建构成博物馆收藏，使之成为可供展览、研究和教育的藏品。

这批印章包括自明中叶以来的各个流派，齐集了清代皖、浙两派、清末民初上海、江浙、北京地区的印人群落。可以作通史式陈述，更可以作为岭南印风源流的重要印证。当中囊括了 59 位（其中 4 人待考）自清代中叶至 20 世纪与广东及香港地区相关的印人，逾 180 方作品。它们能反映岭南印艺三大主流：一、具有浓厚文人气息的「粤派」；二、受「浙派」影响的一支；三、黄士陵（1849–1908）「黟山派」的传承。这批藏印可以对岭南印学发展作线性的历史陈述外，亦可以构成网状的文化脉络。此外，如能配合香港艺术馆的其他篆刻藏品，更可将印学的承传延伸至当代艺术。

本文总结，是次研究不仅初步重构了茶具文物馆藏印的来源，并能从中体现罗博士结集这批藏印时的远见，以及为博物馆付出的无私奉献。

另外，刘浩敏博士撰〈香港近一百五十年印坛辑要〉，总字数逾一万，以香港印学为考研重点，透过详细分析和整合此研究首阶段所得素材，旁参其他学术成果，探讨本地印学文化、地域条件，以重申香港于岭南、甚至中国印学的重要角色。专文摘要如下：

自上世纪初，金石篆刻家因战乱避地香港，或游走于粤港之间，香港印坛日渐成形，他们也成为印坛发展的重要根基。然而，香港并无篆刻史的专著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。关于香港印学的数据，载籍零散，而且多从粤域文化的视角出发，学者仅在梳理广东印学的同时，对香港印人印迹偶有涉猎。

事实上，香港于岭南篆刻史的地位举足轻重，本文旨在综述其历史与发展，透过本地印坛具代表性的例子，涵括源起和发展趋势、印人事迹、文献记载、研究材料各题目，作重点式整理论述，以理解香港印坛的况貌。

另探讨香港如何传承岭南印学文化，按历史进程的规律和特征作分期，突出不同阶段的影响；无论文物保存、印艺流传，抑或是印人的实践与活动，如教学、出版、结社等，以史例说明香港篆刻的独特性。并追溯由黄牧甫为主流的岭南篆刻延至本地的脉络，其传人和印艺得以在香港延续并进一步发展，甚至主导本地印坛。

最后，本文提出香港印学研究的迫切性；虽然当今印学在香港所受重视程度不高，但实在发展条件充足，除了继承岭南一派外，本地公私所藏研究材料也十分丰富，只要加以探究，在传承基础及前人成果之上推陈出新，定可补足香港印学之空白，亦为未来以全国范围进行的印学研究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岭南部分。

综观「茶具文物馆藏印与岭南篆刻研究」的价值和意义，皆在各方面得到充分体现，包括：香港印章历史的梳理及考究、本地藏印数据的系统汇整、印学一手史料的搜集和使用、广东及香港印人传记的撰述，不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成果，以供日后拓展使用，促进交流，也为本地印学研究奠下新里程，将有助于建构香港印史。

此研究得以顺利完成，蒙各受邀被访者黄燕芳女士、杜用庭女士、邓昌成先生、禰绍灿先生、陈用博士、区大为先生接受访问和提供珍贵数据，在此衷心感谢。

此研究的成果，将由香港艺术馆／茶具文物馆拓展使用，以期受众更广。